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 学术讨论会



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确立

(1936-1941)

章百家

内容提要：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抗战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确立。全文分为三部分：

(1) 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与对美政策的起源 战时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36 年。此前，中共一直把美国看作是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此后，中共开始把美国视为一个“反战国家”，表示愿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反日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非执政党，中共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它在内政方面的需要。中共对美政策的转变是与其国内政策的变化相平行的。

(2) 曲折的认识过程 从 1936 年中至 1939 年中，中共领导人在考虑国内和国际问题时，基本把美国看作一支同情和赞助中国抗战的力量。从 1939 年中至 1940 年底，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中共改变了前一时期对美国的估计，一度放弃了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影响中共政策发生变动的因素是：当时，国际、国内都出现了对日妥协倾向，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共关系恶化。

(3) 争取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确立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前夕，毛泽东提出要利用英美外交；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明确提出与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口号；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政策最后确立。中共对美政策的基础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转为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的正义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发展的时期。中共外交工作也是从这时开展起来的。战争期间，对美关系在中共外交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虽然中共与美国建立官方联系是战争后期的事情，但中共开始考虑对美关系却可以追溯到1936年，那时战争还未爆发。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论文和著作已发表了不少，但这些论著研究的大多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重点又多在1944年至1945年，此前的情况则不甚了了。有感于此，本文拟对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作些初步探讨。

一、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与对美政策的起源

为了更好地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简略地回顾一下中共早期对美国的基本看法是必要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起，中国共产党人就把美国视为掠夺和宰割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这个列强的特点是打着“开放门户”的旗号，带着“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企图凭借托拉斯的优胜势力夺取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支配权。^①共产党人坚信，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早期形成的这种对美国的经典看法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大举侵华的序幕，也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们在华盛顿会议上精心构筑的远东均势。通过这次事变，中共看到了美日矛盾的急剧增长，开始注意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不过，年轻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把握国际问题的经验。根据共产国际的解释，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侵苏战争的前奏。在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的“左”倾领导人的影响下，中共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②，对内继续实行打倒一切中间势力，对外继续实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未能根据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族情绪和变化了的国际环境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还特别指出，假如中国想在抵抗日本侵略时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③在党的“左”倾领导人看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政策愈是强硬，那也就意味着它们“愈益成为中国之再分割与瓜分之积极的参加者了”。^④

1935年是中共内外政策发生关键性转变的一年。三方面的情况促成了这一转变：首先，遵义会议结束了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此后，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其次，日本继侵占东北后又进一步向华北扩张，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更加迫切；最后，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崛起，共产国际改变了策略，它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目前正在挑拨和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新形势下，中共明确提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以前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相比，新方针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赞成抗日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也纳入了统战对象的范围。中共表示，为争取反日斗争的胜利，愿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同盟，发生友谊之关系。^⑤

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转变，使中共领导人有可能从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美国在远东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提出自己的对美政策。1936年秋，毛泽东同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作了一次谈话，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这次谈话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开端。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把美国称作“反战国家”，即列强中间“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国家。他认为，美国迟早会“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因为“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他还说：“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告诉斯诺，在建立起一个人民政府之后，中共将力主根据各国的战时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在中国真正赢得独立之后，外国人将有更多的机会在中国得到合法的贸易利益。^②

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表示愿与美国结成某种形式的反日统一战线，第一次从积极的方面评价美国在远东的作用。或许，他此时对美国遏制日本扩张的决心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但他的讲话无疑具有远见卓识。在毛泽东毫无教条主义味道的讲话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从这时起，中共领导人开始把两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观察和思考国际问题。作为灵活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共产党人，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根本看法，仍旧按照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理论来理解美英等国与中国相互关系的本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多少采用了均势论和国家利益的观点来分析国际形势，提出中共对美英等国的政策。与政策的转变相比，领导人思想方法的转变显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制订自己对外政策的时候，中共领导人考虑的不是一般地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武装和政权的非执政党，中共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它在内政方面的需要。抗战爆发前后，实现国共合作是中共开展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和平阵线相结合”，^③这就涉及到两条统一战线的相互关系问题。从当时中共领导人有关统战问题的大量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在国内和国际两条统一战线中，国内统一战线无疑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必须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内统一战线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和发展与国际统一战线密切相连：一方面，中国要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离不开各反侵略国家的支持与援助；另一方面，成功地运用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将可以牵制国民党的反共和对日妥协倾向，促进和巩固国共合作的局面。

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中反映出这样一种认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大国与中国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势力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各大国可以通过各自的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操纵中国的政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之所以有可能从对日妥协转向抗日，不仅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直接危害了他们的统治地位，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一侵略损害了美英的在华利益，使得美英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不但使得美英要求国民党抗日，而且使得美英有可能“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④这就间接地为中共建立发展国内、国际统一战线提供了客观条件。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抗战前夕中共采取了一些行动，力图促成国民政府与美英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反日同盟关系。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在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

达成的协议中包括了外交方面“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一项。^⑧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立即提出“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的口号；呼吁国民政府“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侵略国家合作。^⑨

从1936年中至1938年底，为推动自己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邀请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记者到西北苏区访问。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他们的访问，打破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新闻封锁，使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推动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可以说，这是抗战爆发前和抗战初期，中共采取的一个最有特色而且收获颇为丰硕的行动，它实际是中共开展民间外交的起点。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政权和美国政府之间不仅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也没有进行相互了解的渠道。1937年之前，就连美国政府部门掌握的有关中共的情报都少得可怜，而且很不准确。有价值的报告只有数得出来的几份，还是关于内战时期的。至于一般美国人民更谈不上对中共有任何了解。这种情况在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应邀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之后就大大改观了。从1936年7月上旬到10月中旬，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了92天，行程千余里，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红军的一些重要将领长谈。从苏区返回之后，斯诺很快发表了数10篇报道，刊登在英美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第二年7月，在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中，他的成名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西行漫记》）脱稿，两年内在英美发行了创纪录的19万册，还先后被译成中、法、俄、日、德、意等十几种文字出版。作为一部目击纪实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这部书在美国被誉为“多年来新闻工作最大的成功”，“本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壮举”。^⑩从1937年到1938年，又有十几位外国人分别到各抗日根据地访问，掀起了一个介绍边区情况的热潮。他们之中有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卡尔逊和拉铁摩尔。这四位也是对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例如，卡尔逊是到中共地区访问的第一位职业军人，在华期间一直应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他汇报；而拉铁摩尔后来被罗斯福派到中国来作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当然很不受蒋欢迎。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传播，这些人撰写的报道不仅使美国政府很快了解到中共的政策、主张和抗日战绩，也使得有关神秘的红色根据地的故事进入了一般的美国家庭。无论如何，从这些报道中获益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因为这些报道为一代美国人塑造了中共的美好形象——“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⑪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资料能直接说明中共领导人当时是如何估价这些来访者的。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看来在某些方面，寄予这些来访者的期望可能过高了；而在另一些方面，可能又低估了他们的作用。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来访者当作美国政府的情报人员。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对来访者施加限制。那个时期，中共渴望得到外界的了解，他们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东西。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客人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例如，大到他们的行程起居，小到他们写作用的笔纸，都常常是由毛泽东亲自过问安排的。这种洒脱的态度和朴实的作风使中共得到了来访者们真诚的赞誉。这十几个人在扩大中共对外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巨大，恐怕是当时在根据地的人们所难以想见的；不过，在中共领导人有所期望的直接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方面，很难说这些来访者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尽管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的确是存在的。

1936年至1937年间，中共虽然提出了争取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在许多方面还只是一种初步的设想。当时，中共领导人仍然缺乏分析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经验，他们对美日关系、美中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此外，中共虽然成功地通过美国记者的访问向外界传播了自己的主张，但它还没有找到能够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可靠途径。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共领导人一时还很难做到比较准确地把握美国对华政策，也不大可能制订出一套具体的、有明确针对性的对美政策。

二、曲折的认识过程

从1936年中至1939年中，中共领导人在考虑国内和国际问题时，基本是把美国看作一支同情与赞助中国抗战的力量，认为美国政府有可能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日、有利于中国内部团结的政策。他们希望看到美国对华政策较快地向积极方面转化，最终与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反对日本的同盟关系。

这一时期，中共虽然对美国出现的一些不利于中国抗日的言行不乏批评，但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多少有利于中国抗日的措施都及时地给予肯定。中共对国民政府为抗日而开展的对美外交活动一般也采取赞成与支持的态度。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共对美态度的例子是1939年初毛泽东同一个叫作马丁的外国人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而苏联卷入，它就会减少对于中国的支持，那时，中国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他还风趣地预言：日本终将在中国游击战争的打击下走向衰落，到时候，“苏联给它背上一拳，美国在东面送它一脚，英法从南面给它一下耳光，让日本法西斯见阎王，那就是中国所谓地狱。”^①

不过，从1939年中至1940年底，国际国内局势的恶化使中共领导人很快改变了前一时期对美国的基本估计，不再把美国看作是有利于中国抗战、有利于中国内部团结的因素，一度放弃了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考虑。中共对美政策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中共领导人在思考与中美关系有关的诸问题时一直存在着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美国究竟愿在何种程度上支持中国抗日，美日之间出现妥协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因为美国与日本矛盾的激化，并不能排除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暂时地换取同日本的相安无事。另一个更大的疑问是，美国是否赞同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赞同国共合作，它是否纵容和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因为即使是在美国愿意见到中国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支持国民党抗日并不意味着必然赞同国共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疑问是1939年至1940年间中共政策出现起伏的心理基础。

具体看来，从1939年中至1940年底，中共对美政策的变动是由以下几方面事件促成的。首先，它与美英两国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有关。事实上，直到1939年中，美英两国还没有在支持中国抗战、制裁日本侵略方面采取过重大行动。中共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它们不仅无意制止日本扩张，反而是在“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②当时，毛泽东曾形象地把英美的政策比喻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③稍后，他又进一步把英美所谓的“不干涉政策”说成是“坐山观虎斗”。^④更严重的情况是，这个时期国内、国际都出现了对日妥协的动向。1938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对华策略，加强了对国民

党的政治诱降，国民党内部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又重新流行起来。1939年春，日、英、中、美四国都曾考虑重新召开九国公约会议来结束中日战争，中、美、英三国政府还就此进行过磋商，但未取得一致意见。同年7月，英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单方面向日本作出让步。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不能不把自己的政策重点转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妥协投降活动上来。在《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要求全党“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⑥从这时起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警惕和反对英美可能的对日妥协活动就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的急剧转变对中共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和政策起了关键性作用。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放弃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按照斯大林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美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和平阵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一策略转变带来的影响是冲击性的，各国共产党的政策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混乱，中共也不例外。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之后，毛泽东认为，目前“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⑦在随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共再没有提出或考虑过与美英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问题。

最后，中共对美政策的变化与国共关系的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曾有过较好的合作，中共对美政策也比较积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逐渐把相当一部分力量用于限制共产党的发展；随着国共之间摩擦和冲突的增多，中共对美国暗中支持国民党反共活动的疑虑也迅速增长。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是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苏芬战争期间，当英美等国出现反苏浪潮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出现是在1940年秋，柏林条约签订后，德意日与英美两大集团最后形成了。由于双方都极力拉拢重庆政权，国际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蒋介石抓住这个时机，再次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局势对中共来说十分危急。从9月初到11月初，中共中央在一系列电报和指示中设想了局势发展的种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国民党内暗藏的投降派“组织贝当政府，投降日寇，而与汪精卫合流”；第二种是国民党内大资产阶级顽固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第三种是“美日相持不下，中日相持不下，国共相持不下，欧洲英德也相持不下”；最后一种是国民党在万不得已时在内政上实行某种让步，停止反共战争，减轻高压政策，外交上转到以亲苏路线为主。毛泽东估计，前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反共内战；后两种情况一种属中间状态，另一种则对中共有利。在他看来，在不利的两种情况之中，第一种无疑会在短期内给中共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国民党却再不会有任何前途。第二种是他认为最可能也最值得担心的。按照他的估计，国民党当前的反共活动很象是为最终投靠英美做准备，而“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美国参战后迅速击败日本，在日本投降后“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⑧毛泽东的看法典型地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支持国民党反共活动的忧虑已达到顶点。尽管在一个短时期内，中共领导人并没有作出最后判断，但为防范起见，中共中央一度是按照第二种情况部署工作的。

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政策的这种极度担忧几乎是一下子消失掉的。11月6日，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提供的一份重要情报作出了最后结论：“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④到1940年底，中共领导人已看清，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不在于英美的东方慕尼黑政策，^⑤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采取削弱中国抗日的反共活动。据此，毛泽东指出，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时候，不仅应注意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而且应当注意英美与德意的区别。在英美赞助中国抗日时，不应去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⑥皖南事变前夕，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为了制止投降分裂，“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该与英美作外交联络……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⑦这意味着中共对美政策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又终于向回摆动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共对美政策有四点是需要说明的：第一，中共对英美两国的政策虽然大体一致，但也有些区别。对英政策侧重反对其对日妥协，对美政策则侧重防范其支持蒋介石反共。对这个时期美国逐步采取的一些制裁日本的措施，如废止《美日商约》、发布第一道对日禁运令和向中国提供“华锡借款”等，中共仍在不同程度上给予肯定。

第二，中共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策略，对英美的政策一度出现摇摆，但中国的现实是正在进行的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而不是反对英美侵略的战争；因此，总的来看，当这种理论和策略同中国的实际情况发生矛盾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少是把这种理论同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策略分开处理的。他们始终注视着美英同日本之间矛盾的发展，从不拒绝利用这种矛盾，这就使中共没有重蹈30年代初期不分轻重缓急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错误。

第三，对中共对美政策影响最大的因素实际是国共关系的变化。由于这个时期中共与美国官方人士之间还没有什么接触，除一般公开的消息来源之外，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这就使得中共领导人很难准确地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向，不免会在判断上产生一些失误。皖南事变前夕，随着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中共人员与美国官方人士接触增多，这种情况终于得到了改变。

最后，这个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变化表现为一种急剧的摆动，其中某些调整大体符合客观形势的需要，有些则不尽然。对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变化很难用正确或错误这样简单的字眼来加以评判。从客观上说，这是由于时局扑朔迷离，充满爆炸性，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人们会根据陆续收到的不同情报对局势的发展做出不同的判断。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复变换着的。从主观上说，一方面，这种摆动反映了中共在制订对外政策方面尚处于起步的摸索阶段，政策还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中共领导人高度的警觉性、灵活性和反应能力，这多少有助于弥补经验的不足。

三、争取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了三个阶段，即：以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为契机，经6月的苏德战争爆发，到12月的珍珠港事件。

首先，皖南事变为中共提供了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确切内容的机会，这就使中共领导人在制订对美政策时有了一个现实的基础。皖南事变前，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曾按照毛泽东的

指示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希望美国能协助制止国民党对新四军即将发动的围攻。这些努力虽然未能奏效，但这是中共第一次采取主动措施直接与美国政府联络。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中共通过斯特朗等美国友好人士向外界披露了事件的真相，不仅引起了美国进步人士对中共的广泛同情和对国民党的强烈批评，也引起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关系的注意。1月下旬，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国共“内争”表示关切，并暂停了原订的对华贷款的实施。^④2月初，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柯里来华访问，特地向蒋介石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表示了对中共的赞许，并深盼国共两党“能排除己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⑤对于美国政府为制止国共进一步分裂而采取的行动，中共显然注意到了。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皖南事变后，国共统一战线没有完全破裂的重要原因是国际的压力，包括“英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⑥更重要的是从2月起，通过与美国特使柯里的会晤以及随后与其他一些美国人士的会晤，周恩来了解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力图控制中国以牵制日本，为此不会赞成中国内战扩大；美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对他已有所不满，想施加一些压力促使他改革。由于看到美国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士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及各项民主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周恩来判断，中共在外交方面将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可以大有作为。^⑦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中共重新提出与美英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无疑意味着莫斯科套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用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不加区别地反对战争中的各方是错误的。至此，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理论同反法西斯战争现实之间的矛盾可以解决了。6月23日，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向党内发出了组织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⑧几天以后，他在致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明确地说：“不管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⑨他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这封电报表明，他思想上的一个疑团终于解开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对美政策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那么在此之后，则是以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为基础了。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四周年的宣言中重新提出“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的口号。^⑩此后，在党内的一系列文件中，中共中央再三解释“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⑪

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标志，中共与美英等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最终确立了。1941年12月9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事件传到中国以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在这两份文件中，中共中央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主张中国与美、英“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中共中央要求每一个中共党员“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⑫可以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到来，美国已在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占据了一个十分主要的位置，中共对美政策的目标更加明确，措施也朝着具体化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从1936年中至1941年底，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始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共与美国官方人士的联系微乎其微，它和美国的关系实际是一种间接关系。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内政治斗争，而非直接的外交往来，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中共对美政策则主要是通过其领导人对各种国际、国内问题发表的讲话、指示和各种宣传活动表现出来的。

概括起来，抗日战争前期，中共提出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求美国赞助中国抗战，要求美国赞助中国内部团结。中共希望利用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线，牵制国民党的反共与妥协投降活动。与此同时，中共对美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强烈地反对可能出现的美日妥协，并对美国可能支持国民党反共活动保持着高度警觉。

对中共来说，这个时期在制订对美政策时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怎样认识美国的在华作用，怎样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怎样把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相互关系的理论同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处的现实国际环境结合起来。鉴于直到1940年底，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相当缓慢，美国政府在制订对华政策时也几乎完全没有考虑中共这个因素；因此，中共政策中出现的种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其说是针对美国政策变动所作出的反应，还不如说是中共对美国的认识不断发展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之后，中共积累了自己最初的外交经验，并最终确立了与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为以后中共提出更加积极的对美政策，开展对美外交活动打下了基础。这段经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长久的。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以下简称《中央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至1987年出版，第1卷，第68页；第5卷，第40页。

②同上，第7卷，第445页。

③同上，第7卷，第450页。

④同上，第8卷，第510页。

⑤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以下简称《统战文选》）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62、63页。

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130页。

⑦《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233页。

⑧同上，第234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

⑩《中央文选》，第10卷，第295页。

⑪〔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页。

⑫同上，第66页。

⑬《毛泽东同马丁的谈话》，1939年2月。

⑭《毛泽东选集》，第543页。

⑮《六大以来》上，第1022页。

⑯《毛泽东选集》，第557页。

⑰《六大以来》上，第1028、1029、1054页。

- ④《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2 年，第 134 页。
- ⑤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17、18、32、34 页。
- ⑥《中央文选》，第 11 卷，第 534 页。
- ⑦《中央文选》，第 11 卷，第 428 页。
- ⑧《毛泽东选集》，第 722、723 页。《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 年，第 102 页。
- ⑨《中央文选》，第 11 卷，第 534 页。
- ⑩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 3 编，《战时外交》（简称《战时外交》）（一），第 535 页，台北，1981 年。
- ⑪同上，第 543 页。
- ⑫《中央文选》，第 11 卷，第 625 页。
- ⑬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4、25 页。
- ⑭《毛泽东选集》，第 764 页。
- ⑮《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1 年 7 月 6 日。
- ⑯《中央文选》，第 11 卷，第 707 页。
- ⑰同上，第 713 页。
- ⑱同上，第 786~789 页。